

底蕴与新潮

——东北文艺复兴中的东北小说 □王学谦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东北似乎都很难被完全忽略或遗忘。毕竟有足够辽阔的大地,毕竟有曾经辉煌过的大城市及其工业史,总有些不容易绕过去的沉甸甸的存在。的确,东北的事情很多都不尽人意,让人感到有些憋闷,但如果谈论东北文艺,却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歌手董宝石2019年提出的“东北文艺复兴”,所言不虚。最初在网络上人们将歌手董宝石、拍短视频的老四和写小说的班宇并称“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似乎有调侃的味道,可是随后就蔓延到文学界,有人将沈阳的青年小说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几乎与此同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也成为文坛上热度极高的青年小说家,青年批评家黄平认为他们代表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标志着“新东北作家群”的诞生。

我想,“新东北作家群”应该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小说群落,它的起源应该从新时期文学开始,从那时起,东北文学在不同时期总是产生文学价值丰盈的作家,如马原、洪峰、迟子建、孙惠芬、金仁顺等等。在当代文学中,自觉意义上的流派,几乎都是不充分的,但是,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小说群落是普遍存在的,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京味作家、海派作家等等,今后也会一直存在着。这是因为人们对文学美感的欣赏和接受。在文学中,充沛的地域特色,总是容易为小说增添光彩的。胡冬林的长白山叙事,无疑为他的作品增加了美感的光亮。王怀宇的长篇小说《血色草原》具有浓郁的东北草原文化特色,让人想起端木蕻良笔下的大草原,一直对乡土文学深有研究的学者丁帆读后,就想起“重建东北作家群”。读了王可心的《西山谣》《头顶一片天》和夏鲁平、朱日亮的小说,即使是日常生活的叙述,也很容易感受到东北生活和文化气息。人们愿意欣赏具有特异风味的美感,这是“新东北作家群”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地方性不能代替文学性,地方性并非必然地增加文学的美感。那些一流的东北作家和优秀作品,如迟子建、金仁顺、孙惠芬、洪峰、马原,他们绝不仅仅在于东北的地方性。宁可说,他们在东北之中却又超越东北。地方性也仅仅是在文学性充沛的时候,才给文学美感增值加分,也就是说,他们以其文学性获得人们的认可,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历史的认同。

这里,我们不必拘泥于字面,而是应该以更开阔的

胸怀去感受、观察和思考。所谓“复兴”,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像过去一样,而是超越了过去,因为过去是否是真正的繁荣,也是不能不让人困惑,更主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令人鼓舞、振奋的新意味或新境界。这种新并非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突然间的焕然一新,不是在一个历史激变的时代突然爆发出一种文学革命,而是在一个相对宽阔的历史地带或审美地带的零散的蔓延或渗透,近乎不经意的星星点点的偶然闪亮,在不知不觉之中获得一种充实的文学性升华。的确,“下岗”是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主要表现对象,这是他们的东北特色所在,还牵连看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如果有对东北当代历史的了解,无疑更能理解他们提供的美感,更容易引起感情的共鸣,但这也仅仅是他们文学的基本面,并非他们的卓越之处。在底层文学的潮流中,又有多少作家在写“下岗”甚至比“下岗”更残酷的底层生存和生活呢?更何况“下岗”潮流早已过去,再也无法吸引人们的关注了。我以为,他们获胜的奥秘或卓越之处在于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和精细的描摹,这恰恰就是文学性的高处,这不是地方性能够做到。文学是表现永恒人性的。你固然可以写社会热点问题,甚至可以雄心勃勃地去写一个时代,也可以写一些奇风异俗去吸引人的眼球,但是如果不能潜入人性海洋的深处,就无法打捞出文学的珍宝,就无法以美感征服人心。双雪涛的叙事复杂,而班宇大部分作品是平铺直叙,但是你会发现,读他们的作品,人性的状态——人的性格、命运以及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尤其是内心深处微妙之处,总能饱满、丰盈,成为作品的最深沉、浑厚的美感,总是能够打动人心。阅读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和班宇的《冬泳》,其故事无论是稳健的写实,还是叙事迷宫的组建,都直指性格、人心,都凸显出主要人物命运、性格和内心状况。《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性格,没有淹没在悬疑小说的叙事迷宫之中,毋宁说得到了强化。《大师》是缜密的写实,父亲的形象栩栩如生。《逍遥游》的责任编辑吴越,在谈到《逍遥游》的时候,提到了张爱玲的小说《花凋》,这不能不说有一种深刻的眼光。《花凋》写一个女孩在疾病的摧残之下,生命的凋零过程,其美感的力量在于对女孩内心活动的精准勾勒,《逍遥游》没有写死亡,它写的是挣扎,绝望的挣扎,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贫困和绝对的重压之下心路历程,被班宇写得跌宕起伏、步步惊心。

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出现并非偶然。如果以地域性为尺度的话,其背后有东北文学的根基和底蕴。翻阅当代文学史,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东北文学不算单薄的身段。它有足够的体积和重量,也有自己的风度。中国文坛潮流的一波一澜,都会在东北文坛掀起一朵朵浪花。“文革”结束,新时期文学开始,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底层叙事乃至2000年以后,东北文学也是披荆斩棘,留下了许多值得回顾和珍视的足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短篇小说影响极大,全国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万众瞩目,首届“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有两位东北小说家的小说获奖:一个是王宗汉的《高洁的青松》,一个是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在后来的中短篇小说年度评奖中,东北小说家也是接连获奖。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高昂旋律中,东北作家的锐意探索,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徐敬亚《崛起的诗群》是1980年代初期关于朦胧诗的重要评论,也是当代文学史所记录的“三个崛起”之一。张笑天也许是一位被文学史低估的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多样,数量巨大,对现实生活和时代变革具有高度热忱与敏感。他的《离原上草》是1980年代初期挑战禁区、探索人性的力作。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公开的内参》近似于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呈现的是时代变革中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有一位不该被忽略的作家,那就是邓刚。邓刚小说写工厂改革,也写大海。我们的文学缺少对海洋的关注。邓刚的海洋叙事,从五四到现在也无人能敌。1980年代中期,在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浪潮中实现了审美突破,东北小说也获得长足的进展。韩少功首倡文学寻根,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文学的“根”》发表在长春的《作家》1985年第4期上。马原、洪峰作为东北的先锋小说家,其探索的锐气和才华,也为整个当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影响深远。此时,迟子建也崭露头角,在1990年代之后,迟子建有更大的发展,她不仅是东北的文学首领,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前排大家。随后,孙惠芬、金仁顺也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作家。在“70后”作家之中金仁顺也是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一位。

现在,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创作,是东北文学延伸和发展,也是东北献给当代文坛的饱满果实。我衷心希望他们走得更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成了极乐之地,早点摊蒸腾的雾气搭配着人物闲适的心境,那置身其中又飘忽其外的微妙感受使每讲下一分钱都觉得开心,让一买一卖“就像做游戏一样”。小说对生活细微场景的描摹显示着文学语言本身的趣味,而被叙述的人间喜乐又汇入人们忙生计的现实之中,不禁带出了苦中作乐的滋味。是的,二先生有酒有诗,但也少不了俗世的烦扰。学编导的儿子大学毕业没有工作,二先生便开玩笑似的要同他做一部纪录片,拍摄的对象自然是早市上再熟悉不过的商贩。仿佛一切都来得莫名其妙,但放在二先生身上,“他要干的事一定有他的道理”。至于纪录片最终获奖,更像是额外的赠予,而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却是二先生给儿子上的重要一课。但于德北显然不想让小说变成“我们如何做父亲”的说教,他面对的是早市这一可被无限放大的市井生活。被拍摄的七户商贩各有各的故事,或者说他们在被拍摄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存在,发现了夜以继日的疲惫中那些已然意识不到的幸福、艰辛、悔恨和希望。更重要的是,于德北没让二先生成为救世主或什么心灵导师,他只不过是一个有着两次不完整的婚姻、帮前妻带大女儿、常去敬老院做义工、用酒精、一丝不苟的工作及散漫的生活包裹或者说冲淡了内心苦楚的中年男人。二先生不是散仙,他更像市井江湖中落魄的游侠,他用看似消沉的生活来对抗生活的消沉,在细微处温暖他人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救赎。没有二先生的世界不会发生什么改变,正如没有二先生的早市依然生意兴隆。但没有二先生,早市便少了些味道,它让肉摊老板失去了为人提前开好五花肉肉的“再平凡不过的情谊”,让旧货商贩少了日常的“凡人”的力量,那种不经意的执念犹如照亮庸碌煎熬的灯火,让人在生存之外还能察觉某些可以被称之为生活的东西。

等待是值得的,吉林文学正在不断展示它的生机,王可心的《风从北边来》、高君的《柔情史》、金昌国的《秋分》、翟妍的《长河》等作品相继出版和推出。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在阔大的生活中呵护起那束卑微又倔强的微光,或如高君所说,“向卑微纯洁和清醒的生活致敬”。我不太愿意将这种生机的到来归结于“东北文艺复兴”之类的媒体狂欢,就像有网络评论戏言“每个冬天,东北都要被‘文艺复兴’一次”。吉林文学从未消沉或有待复兴,它只是带着寒冬与这片黑土赋予的精神和气质,坚韧、恒久地兀自生长。

小说是自生的,你无法刻意设计它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破土而出。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文学潮流都只是偶然,犹如一场大雨恰好让那几株潜伏在那里的蘑菇见了天日。这需要足够的耐心,任其自然、充分地积蓄力量。这种等待往往是煎熬又令人憧憬的,就像在东北度过一个被大雪覆盖的漫长冬天,会有怎样的生机在雪下的黑土酝酿?

“腊月是东北最冷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冻得咣吧咣响,做什么事容不得怠慢和犹豫,于是这里的人性心急,做事直截了当,来不得含糊拖延。而对于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温和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不同,他们做事三思而后行,极为含蓄,也极为隐蔽,就像那时许多单位需要保密。保密单位都是用数字代替的,比方说,长春航空液压厂,叫133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叫652厂;厂办小学叫652小学,中学叫652中学。”在夏鲁平《遥远的筒子楼》里,两三句闲话式的交代几乎包含着长春的半部历史。这里有属于东北的文化性格,也有来自那个年代特定数字所隐含的荣耀,以及这荣耀远去后的失落与苍凉。那个时候,住在平房生起炉火的人家分外眼热652厂筒子楼里被生产间余热充满的暖气片,你能带朋友看绿色或者白色吗?”也许是罗叔叔炒菜的香气。但是,这个努力维持体面的大厂高工,却被撞见正从邻居沸腾的粥锅里舀米。这是小说中无声又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边是罗叔叔瘫倒在地,痛苦地揪起自己的头发,一边是母亲退回屋里,用手紧紧扣住“我”的嘴巴。他们的哭,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这压抑的寂静中,是一个体面人的崩溃与生活之难,也是母亲于相同的困境中对这种艰难的体谅和对罗叔叔无效却已竭尽所能的宽慰。许多年后,罗叔叔的儿子带着父亲遗留的日记与“我”相见,那些“见不得人的隐私”或者说罗叔后半辈子的心结才在小说里一一呈现。《遥远的筒子楼》讲述的不过是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记忆,但夏鲁平不怀旧,没有沉溺在工业老大哥的光辉岁月里,反倒写出了荣耀与艰难的共生。那是被外人羡慕的筒子楼中的苦楚,是一个知识分子欲求体面而不得,是一个善良女性的无奈和本不该她承受的自责,是在充满时代气息的荣光与现实生活的窘迫之间,人们依然试图带着尊严和人情味努力地生活与自我救赎。它不是缅怀那个远去的时代赋予东北的轰轰烈烈的最强音,而是在逼仄的筒子楼和荡气回肠的炒辣椒气中重申文学或生活之于东北的意义。

等待那束让灰尘跳舞的光

□李振



如果说《遥远的筒子楼》是有关当代长春的个体记忆,那么金仁顺的《小野先生》则把笔触推向了更为久远的时空。事实上,很难一下捋清《小野先生》要专门写个什么,它短小的篇幅承载了过于复杂的内容。“我”和小野先生的见面首先完成了对长春风土与历史的扫描。这座城市在“我”眼中似乎有些尴尬:“夏季碧波如海,冬季白雪皑皑,但朋友来的时候,你能带朋友看绿色或者白色吗?”也许可以聊聊历史,于是有了当年的满映和后来的长影,有了规划、建造于100年前的新民大街和围绕它的伪满国务院和八大部,有了如今成为酒店的关东军司令部……但是,没有人的故事,这只能是索然无味的词条及注解,它还需要一些东西为之赋予生命。所以又有了勇气、爱情、怀念、困惑和救赎,有了活生生的人和可以被细细讲述的动人话语,莉央、小野先生一家以及寿喜烧老板的故事才被一座城市的历史巧妙地串联起来。小野先生的父亲和寿喜烧老板曾同在关东军服役,战争的创伤在很多年后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小野先生的母亲留下一封道歉信离开了家,而今天的莉央也是如此。历史学教授小野先生与莉央因写作相识,他只是想以文学的方式补充父辈们至死都无法讲出的故事:“普通人在历史里面,像一粒灰尘,什么都不是,它们能起的作用可能是让历史学家们因为灰尘过敏而咳嗽几声,可有的时候,在某些光柱里面,这些灰尘是能够被看见的,它们微小、轻盈,在光影里面颤动,舞

蹈。我想,或许学好写作技巧,就相当于有了一束能让灰尘显形、跳舞的光吧。”也许小野先生的话不只是作为情节存在,它还是作家对于文学的可能甚至是使命的理解。它的存在为小说人物所进行的选择提供动因的同时,也在写作的层面为那些有关城市或历史的讲述赋予了灵魂。正因如此,小野先生才会在伪皇宫的照片墙前显示出近乎“愚蠢”的执拗,这也是他在这座父亲可能留下痕迹的城市所必须给予自己的某种交代。它不再是对历史的考证或想象,而成为一个人面对情感、记忆或自我不得不寻求的一个出口,这就像莉央和小野先生的母亲决定离开,就像寿喜烧老板依靠滔滔不绝和酒精度过了后半生,就像小野先生的父亲在80岁选择自己抹掉了所有生活的痕迹。这不是人与自我或外部世界的和解,倒像某种被无限认定的自我毁灭式的撕扯与对决。它是人类心理与情感无法走出的莫比乌斯环,亦是文学与生活永远无法划清的界限,或许还是没有存在感的灰尘在磅礴的历史中可选择的存在方式。

那么,有谁见过清寂如二先生般的酒糟子?《二先生》可能是最契合于德北气质的一篇杰作。早晨一斤老酒,中午啤酒尽兴;上午工作雷打不动,正午时分准点收工。这听上去有点儿矛盾,可在二先生那里顺理成章。二先生爱逛早市,几样蔬菜和一小条五花肉足以解决一日的餐食,之后便可安心在旧货摊上寻些心仪的玩意儿。于德北几乎让早市

近年来,随着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作家在当代文坛的“崛起”,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展开了一些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讨论。在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的热潮中,吉林文学不是以“狂飙突进”的“崛起”姿态出现的,而是一直保持着自身平稳向前的风格。

鲁迅在给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所做的序言中,赞扬萧红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死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北方人民的生的坚强”或许是吉林文学的重要底色。“北方人民”是地域的特色,“生的坚强”是环境的艰难与求生活的执着。

在我们的生活常识中,矿区的生活应该是很苦的,也是很危险的。在这种生存的困境中,往往可以见到人性的惯常与突变。金仁顺、金昌国的很多小说都与这种矿区生活有关。金仁顺新近创作的《众生》中的一些篇目就延续了《喷泉》等和矿区生活有关的题材,呈现出了在艰难度日的时代里,人们如何为了“生”而失去生命。《众生》中的《朱慧玲》,讲述的是我童年时的伙伴朱慧玲因为抢救“红宝书”被河水淹死,而后成为了插图、版面上的英雄人物。但我们一直怀疑这样的英雄人物会出现在我们身边,最后的结果也证实了我们的猜想,“那本毛主席语录里夹了五斤粮票。宋惠玲怕回家挨爸爸的打,才跳进河里去追语录的。”“五斤粮票”就是“凡人”与“英雄”的距离,同时也是“生”与“死”的界限。将生的沉重熔铸在伟大与平凡的毫厘之差中,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不堪与卑微。矿难恐怕是所有有关煤矿小说中最沉重的话题,因为有生命纵即逝。与这种突如其来的噩运不同,还有一种是生的煎熬。金昌国的《秋分》讲述的是在矿区生活的老于、老相两人的日常琐事。本来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生活,却被一场突发的意外打破平静,让两人的日子雪上加霜。老于和秋分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奔丧,留下女儿小吉照看家里。小吉和老相的女儿小慧,吃完晚饭后在雪夜里一路玩闹回到家里。“回到屋里,小吉用无烟煤泥压上了炉子,开始做作业,等到十点钟,雪开始下大了。”两个孩子因煤烟中毒失去了生命。生活在北方的人,大都会理解发生在冬日夜晚的这种悲剧。因为居住条件、天气原因等,在冬日的夜晚入睡前,大家都会把煤球在炉子里,让煤炭缓慢燃烧,其实就是不充分燃烧,释放热量,这样就不至于在“后半夜”很冷。两条生命的逝去,给两人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逝者已去,但生者还要活下去。老相家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就女儿小慧是个健康的孩子。秋分觉得这场悲剧是由他们家引起的,于是决定把女儿小慧送给老相家。“死的悲剧”先毁灭了两家人的生活,这又接踵而至的“生的割舍”与“生的接受”,同样在亲情、伦理等方面撕扯着两人的痛感神经。为了避免日常性的阵痛,老于和秋分不再去老家了,直到“女儿”小棋结婚才坐了一夜的火车赶了回来。这种“碰面”自然是十分尴尬的。小棋的哥哥宝子为了参加婚礼,开长途车因疲劳驾驶出了车祸,造成下肢瘫痪。日常度日的艰难中,还不断有无常的悲剧袭来。这生的艰辛中,还要承受由此而来的死之离别。金昌国笔下的这场悲剧其实就是“北方的”,而且是北方冬日里独有的。这种经验固然是惨痛的,但在文学叙述中也有着特殊性。王可心的小说集《头顶一片天》中,主要写的是底层生活之艰辛。《一双耐克鞋》同样延续了此前关于底层书写的主题。小说讲述一位母亲为了给自己喜欢打篮球的儿子买一双耐克的詹姆斯系列球鞋,省吃俭用费尽周折,颇受屈辱的过程。这双鞋要两千多块钱,是吴爱莲一个月的工资。儿子考上了大学,靠着单亲家庭和低收入证明获得了学校的助学金,吴爱莲一个月的工资刚好够她和儿子的生活费。为了买这双鞋,吴爱莲想办信用卡,但她没有正式工作银行流水少办不了,“花呗”和“白条”里可用的钱也少得可怜。去姐姐家借钱,“姐姐像撵狗一样把她轰出门,临关门时还告诉她,不许为了买鞋不还钱,晚还也不行。”借钱无果后,吴爱莲就自己攒钱,她每天只吃饭,不吃菜和水果,步行上班。就这样,攒了两个月薪买了一双鞋钱,当向商场准备付款时却发现钱没了,钱应该是坐公交车时被偷了。她崩溃大哭,后又重回起点继续攒钱,终于买了一双耐克鞋给儿子邮寄了过去。这回算是“梦想照进现实”了,但现实对吴爱莲母子却依旧那么“骨感”。鞋寄出不久,吴爱莲就接到通知,她儿子所在的学校来电话,就因为那双耐克鞋质疑给吴爱莲家开了虚假的低收入证明,取消了她儿子的助学金。吴爱莲不服,她要去儿子的学校理论,《一双耐克鞋》除了让我们看到底层生活之艰难,我们也没有看到吴爱莲如何能找到改变生活困境的路径。同时,让我们感到更加悲观的是,学校对待吴爱莲们的态度,一个拿助学金的孩子就不能或不应该穿耐克鞋吗?助学金一定要有一个“穷困”的外在形式来支撑吗?吴爱莲的反抗可能无济于事,但她的姿态就是“生的坚强”的体现,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对这种“生的坚强”的有力声援。高君的《柔情史》同样是讲述贫穷与底层的故事,小说以情感为线索,用命运的沧桑与浑厚,在欲望与“柔情”之间,展现了生命的蛮力与向上的挣扎。《柔情史》带有“寓言”式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生的坚强”的虚构性超越。

在专注于对“北方的、生的坚强”书写的同时,吉林的作家也有着更为宏阔的创作视野,他们把创作的目光投向历史的同时,也追踪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书写当下生活中的百态人生。金仁顺的《小野先生》将创作的视角拉回到历史的时空之中,以“我”与作家小野先生的相遇,带他参观长春市的历史建筑为线索,在回溯历史的同时,深入探讨在历史进程中,个体行为与历史苦难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如何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获得自我的救赎。最终,小野先生在与写作相遇中寻求到了自我救赎的方式。小说既关注了民族记忆,又探讨了写作是如何在叙述中完成自我精神自救的。夏鲁平的《养水仙花的人》聚焦当代都市的老年人问题。叶之谦的老伴得了重病,一番治疗后也还是撒手人寰。在老伴去世后,叶之谦拒绝和女儿到南方散心,而是独自留下来,如何度过剩余的孤独岁月,是留给叶之谦的难题。一日叶之谦去早市闲逛,看到有卖水仙花的,就买了三颗种子回家种。因为老伴去世前,自己喜欢水仙花,这对叶之谦来说也算是睹物思人。然而奇怪的是,家里的水仙却莫名其妙地变多了,对此,叶之谦百思不得其解。又一日,叶之谦来到早市的花卉摊前,正琢磨着家里的“怪事”,突然女儿来电话询问他家里的水、煤气等是否都关好了。听了女儿的询问,叶之谦二话没说就紧张起来、瘫坐到地上。后来邻居来早市找他,告诉他有一人进到家里关掉煤气,才免得一场火灾。叶之谦回到家后,才发现进到家里的居然是老伴病友的侄女张水仙。张水仙告诉叶之谦,是他老伴在去世前偷偷给了她一把家里的钥匙,让她没事的时候,照看一下叶之谦。而家里多出来的也是张水仙偷偷种的。在离别之苦后的孤独生活中,叶之谦努力不给女儿添麻烦,自得其乐。但岁月不饶人,随着身体的衰老,记忆、精神、心理等方面的问题随之而来。叶之谦的难题不是他独有的,而是当代都市中大部分老年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作者在小说中给了叶之谦很多的温暖与“关照”,并没有将更为严峻真切的“体验”放置在小说的叙述中。这种“回溯”可能也是因为有了太多的“生的坚强”之后,生活需要一点儿温馨来慰藉。

「北方人民的生的坚强」

——东北文艺复兴中的吉林小说

□张涛